

区域文化教育丛书

潮汕佛教研究

郑群辉 著

佛

潮上齊居處士家溪源疎柳
望中餘安時為善年。標處
願諱身事。佳竹景夜香紅
西隔南窗春點磨頭余此後
不作紅塵客迢遞寒江幾度
花十月望日安處齋書并賦
長日倪瓚寫

永豐筆
歲次甲午年春月畫上人



暨南大學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潮汕佛教研究

郑群辉◎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潮汕佛教研究/郑群辉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5. 5

(区域文化教育丛书)

ISBN 978 - 7 - 5668 - 1326 - 8

I. ①潮… II. ①郑… III. ①佛教—宗教文化—文化史—研究—潮州市②佛教—宗教文化—文化史—研究—汕头市 IV. ①B94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4325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

定 价: 43.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潮汕地区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概述 / 13

第一节 潮汕地区的自然环境 / 14

第二节 潮汕地区的人文环境 / 16

第二章 唐代的山林佛教 / 21

第一节 佛教初传潮汕 / 22

第二节 潮汕唐代佛教的特色 / 27

第三节 大颠与韩愈 / 32

第三章 宋元的福德佛教 / 43

第一节 宋代潮汕佛教的盛况 / 44

第二节 宋代潮汕佛教的基本特点 / 57

第三节 宋代潮汕佛教对社会经济文化的贡献 / 61

第四节 大峰与和平桥 / 67

第五节 五代及两宋在外地弘法的潮州籍高僧 / 72

第六节 元代佛教及胆巴帝师的潮州行 / 79

第四章 明清的民俗佛教 / 91

第一节 明代佛教 / 92

第二节 清代佛教 / 111

第三节 宗派传承 / 128

第四节 明清民俗佛教的典型表现 / 143

第五章 近代的东密 / 155

第一节 民国潮汕佛教概观 / 156

第二节 东密的兴起及传播 / 166

第三节 白衣阿闍黎王弘愿 / 174

第六章 佛教民俗文化 / 185

第一节 佛化葬俗 / 187

第二节 佛化节俗 / 192

第三节 佛化俗语 / 198

第四节 潮州斋菜 / 205

第五节 潮汕佛乐 / 215

第七章 潮汕善堂的历史起点及宗教文化意蕴 / 225

第一节 潮汕善堂之历史起点 / 227

第二节 同治、光绪以来的善堂 / 235

第三节 潮汕善堂的宗教信仰底蕴 / 241

附录1 女出家人的神秘世界 / 253

附录2 潮汕道教总述 / 266

参考文献 / 271

后 记 / 278

绪 论

一、潮汕佛教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价值

潮汕佛教文化的研究属于区域文化研究。所谓区域文化,是指在一些特定地域,表现出较大一致性和稳定性的某些文化因素、文化样式、文化类型。如三秦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等。区域文化还可细分为各种亚文化类型,如潮汕文化是岭南文化的广东三大亚区域文化(广府、客家、潮汕)之一。与一般文化研究不同,区域文化研究不仅可以让我们认识和了解中华整体文化的某些差异性、特殊性,感受中华文化的众彩纷呈和博大精深,还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真切地触摸到文化的脉动,感受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进而将其转化为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由此,区域文化研究形成了一股不小的热潮,方兴未艾。

作为中华大文化下的地域性文化,区域文化往往有着与周边其他地域不太一样的文化特质,即便是属于岭南文化的潮汕文化,它与广府及客家文化也有某些不同,这表现在许多显而易见的文化事相上,如在方言、民俗、戏曲等中,其中一种显著的文化特质就是宗教因素。各区域文化在其历史建构过程中,宗教都要积极参与其中。佛教,作为一种历史悠久、影响深广的社会文化现象,非常神秘而又非常世俗、非常熟悉而又非常陌生,人们从小耳濡目染。它过去存在过,现在发展着,并且走向未来。不管各个社会时期人们对它有着怎样的看法、做法,它实实在在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各个角落,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人文环境及其在文化建构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潮汕历来就是宗教信仰较为浓厚的地区,本地区的佛教、道教、基督教以及多种民间信仰(如三山国王、妈祖、真武、双忠、龙王、雨仙等)都发育得较为成熟,宗教信仰资源非常丰富,而佛教的元素在这一区域文化中更是占了很大的比重。

总体而言,自汉代以来,中国就形成了儒道佛三家并存、各种民间信仰此起彼伏的宗教多元化文化。但就区域文化建构过程来说,除去占主流地位的儒家不论,不同宗教(如佛、道、基督、民间信仰等)所起的历史作用、所占的文化权重以及历史地位等,却是不一样的,所形成的区域文化特色也不一样。潮汕不仅历来有“海滨邹鲁”、“岭海名邦”的美誉,也是岭南著名佛地。佛、道两教从传入的时间看,从现有的资料来说以佛教为早,并且长时间占据了主流地位。佛教从南朝刘宋年间(420—479)(详见本书第二章)就传入潮汕,有1500多年的历史,对潮汕文化的塑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儒佛交辉”是饶宗颐先生对潮州文化源头的定性,若我们把各种民间信仰归入小传统文化,那么,在大传统文化(儒、道、佛)当中,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潮汕文化主要特质的把握。它揭示了儒佛两种文化在潮汕文化建构中主要的异质互补——正统道教的作用和影响,在潮汕文化建构中一直不能与佛教相媲美。这从其宗教地标中也能看出来。从思想文化方面来看,中国文化总体而言无疑是儒道佛三教混融的文化,但一般来说,每一个地方都有其较显著的宗教地标。谈起潮汕地区的宗教地标,我们马上会想到潮州开元寺、潮阳灵山寺和揭阳的双峰寺,正如谈到惠州地区时,我们会首先想到道教圣地罗浮山一样,尽管惠州地区的佛教也同样兴盛过。在潮汕,从唐代迄今也创建过一些道教宫观,但从来就没有一所道教宫观可与三大寺相提并论,更没有所谓的道教名山,在惠州地区情况则恰恰相反;在潮汕,起码还出现了大颠和大峰这两个在区域文化中影响深远的宗教人物,道教则一个都

没有，而高僧大颠、大峰之于潮汕，也正如高道葛洪、黄大仙之于惠州。这些地标性建筑和象征性人物的明显不同，或足以表明粤东与粤中区域文化的某种差异性。佛教在潮汕的深刻文化意义，正如道教之于惠州。

自唐代至今，潮汕佛教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面貌并不相同，但都对塑造潮汕文化起到重要作用。中唐大历到贞元间（766—804），本地高僧慧照、大颠西传禅宗南宗法脉，开法潮阳，秉承禅宗南宗单刀直入、明心见性的宗旨，建立岭南又一禅修中心，显示了山林佛教特色。其追求心灵超越解脱的精神，激励了后世无数潮汕僧人追求佛法的最高灵境；大颠与韩愈交往的故事，则象征了潮汕文化中儒佛的互补与交融；以儒佛交辉为主体的潮汕文化雏形开始彰显。

宋代潮汕佛教积极入世，以菩萨普度众生的姿态介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以出家人为中心、为指导，僧俗大众以“种福田”的观念厉行慈善公益事业的福德型佛教。其最大的亮点在于，在为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同时，以大峰为首的宋代“劝首”们济世利生、热心公益慈善的菩萨精神，也深深感召了潮人社会，受到后世潮人高度尊崇、继承和发扬光大。大乘佛教提倡教徒要“六度万行”，六度之第一度就是“布施”度，布施及其功德是大乘成就佛道的始基，布施的对象是芸芸众生，而非仅惠及佛门，所以福德佛教的理念和行为惠施了潮汕民众，从而在民众中间延续了乐施好善之风。从清初发展至今的潮汕善堂文化，赓续的主要是大峰祖师的香火。在我们看来，潮汕善堂文化的中心理念，就是佛家大悲愿心和布施功德的倡导。这是“大峰”们给后世潮汕文化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宋代福德型佛教贯穿了整个潮汕文化的建构过程。

元代佛教在元蒙统治者的扶植下继续兴盛，藏传密宗曾在胆巴帝师贬潮时期一度流行于潮州地区，寺院主要是在地方官吏的直接参与、主持下修建，寺院经济日益发达；与宋代佛教相比，民众崇佛之风依然浓厚，但出家人失落了其济世利他精神，为后世佛教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明清以来，正统道教宫观进一步凋零，道士星散，而民间信仰的发展却异常迅猛，遍地林立的妈祖庙、大忠祠、双忠公祠、真武庙、关爷宫、三山国王庙等，就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这并不是说宋元时期没有这些信仰，而是说到明清以后发展更加壮大——正是正统佛、道教的持续走下坡路，给了民间信仰巨大的发展空间。潮汕文化由此形成了儒、佛、民间信仰三足鼎立或者三者混融的局面。在我们看来，我们今天所谓的潮汕传统文化，更多的就是以上三者的融合，是三者的水乳交融。我们把这一时期的佛教称为“民俗佛教”。它是宋元福德佛教的进一步开展或异化，只不过在佛教寺院的功能及其僧人的角色、职责上，与宋元代相比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表现为以迎合、俯就庶民的宗教意识、现实利益、愿望追求等为能事，从而使宋代以前尚维持的宗教的独立性、超越性宗教品格最终丧失，而与潮汕民间思想观念、民间信仰、民间习俗混融合一；尤其表现在形塑了多种多样的具有潮汕本土特色的佛教民俗文化。

20世纪70年代，佛教及其他宗教一度沉寂。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但处于大改革、大变动的国家战略转型时期的今天，民众生活中诸如官场、商场、职场、考试、医疗健康等的不稳定因素也进一步增加，各种心

理压力持续增大,宗教需求自然也日趋强烈,以心灵抚慰为基本社会功能的宗教也就有了广阔的心理需求及经济市场。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信仰消费”市场的逐步放开,在宗教底蕴本来就深厚的潮汕大地,民间新一轮的“宗教热”可谓方兴未艾。如拜神消费,有人把潮人拜神的动机和态度归结为祈福类、从众类、习惯类和认同类等四种类型^①,看似宗教性的活动其实都是人的心理和社会性需求的表现;据2003年一份调查报告可知,潮汕城乡经常性参加拜神活动的人数占人口总数80%。拜神节日分为两类:游神赛会和初一、十五。每年的拜神消费支出约占家庭总消费的10%，“城市家庭个别拜神活动的开支要高于农村家庭,而平均每月的拜神开支农村家庭并不比城市家庭少”^②。由此可见,拜神活动在潮汕城乡是常态性的宗教活动,拜神消费在家庭日常消费中占了不小的比重,也可知民间的宗教信仰氛围之浓厚。

就潮汕地区佛教本身而言,因为信仰底蕴深厚和政策允许等因素而得以迅速复兴。潮汕寺院重建工作开展之早和寺院建筑重建、创建数量之多,在全国范围来说都是少见的。例如,新时期粤东首刹开元寺的大重建,在时间上就走在广东乃至全国各大寺院的前面。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时期各战线“拨乱反正”的标志,宗教政策逐步得以落实。短短半年后,1979年7月16日,中共潮安县统战部、潮安县外事办和文化局就向广东省相关部门作了《关于全面修缮开元寺接受侨胞捐资的请示报告》,并于同年9月接到同意意见的复函^③,自此拉开了开元寺大重建的大幕。1980年3月20日,潮安县地方党政负责人、开元寺筹建委员会委员、香港潮籍佛教观光团成员、僧俗教徒等数百人在开元寺隆重举行修建奠基典礼。其时韶关南华寺仅重修寺内的六祖殿^④,大规模重修工作尚未开始;广州六榕寺重修工作到1984年才开始^⑤,广州光孝寺则迟至1989年12月^⑥。可见,在广东潮州,在宗教氛围浓厚、侨胞的鼎力捐资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三者共同作用下,新时期潮州开元寺率先得以重生。

开元寺的大重建极大地带动了其他潮汕寺院的重建工作。改革开放后,潮汕寺院在重建并恢复开放的数量上,呈现了迅猛的上升势头。据资料显示,改革开放10年后的1990年,潮汕修复开放的寺院共计211座,僧尼505人;2002年12月,寺院共计313座(精舍不计在内),僧尼1154人^⑦;而到了2009年,潮汕三市对外开放寺院达到了370座,其中潮州市120座^⑧,汕头市112座^⑨,揭阳市138座^⑩。370座寺院,这是什么概念?从密度上而言,在一个一万三千多平方公里的区域里,平均每35平方公里就有1座寺院,

① 李继宏:《玉窖镇拜神消费的个案研究》,《潮学研究》2012年第13期。

② 邝建彬等:《潮汕地区拜神消费的调查报告》,王晶主编:《潮汕区域文化研究——韩山师范学院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成果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

③ 释慧原:《潮州市佛教志·潮州开元寺志》,潮州开元寺1992年内刊本,第124~125页。

④ 何明栋主编:《新编曹溪通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790页。

⑤ 余庆绵主编:《广州六榕寺志》,1999年内刊本,第416页。

⑥ 黄为亮:《圣寺重光说河林——写在佛教僧团接管光孝寺三周年》,《广东佛教》1990年第3期。

⑦ 林俊聪编:《潮汕庵寺》(下册),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页。

⑧ 林福治主编:《潮州佛寺》,香港:天马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⑨ 周淑珍主编:《汕头佛寺》,香港:天马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⑩ 周淑珍主编:《揭阳佛寺》,香港:天马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307页。

密度非常高；就潮汕历史而言，通过笔者考证，唐五代兴建寺院9座，两宋兴建91座，元代27座，明代85座（详见本书第二、三、四章），清代、民国时期无法作较完整统计，姑且假定清代至民国兴建新寺院为100座，那么，现今潮汕三市区域内历朝历代所建寺院为312座。也就是说，今天对外开放寺院竟超过历代兴建寺院的总和！当然了，若考虑到历代因私建而未载入方志的寺院（即历代寺院总和不止312座），而新时期以来有些寺院又属新建等因素，那么，也就是说，这370座寺院把存在过但又湮没的绝大部分各朝寺院重新恢复了。若考虑到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的寺院都存在兴废不一的状况，那么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今日建寺修寺力度之大、寺院之多、佛事之盛。

而今，潮汕共有370座以上寺院正在运作，绝大部分寺院因为重建或改建而焕然一新，香火鼎盛，僧尼1000多人，信徒不计其数。

佛教传入潮汕1500多年来，风风雨雨，兴衰轮替，总体而言就是“佛教的地方化”和“地方的佛教化”的双向运动过程。一方面，它要适应本地区的环境（包括自然和人文环境），也要因应某一时代要求而作出自我调适，从而争取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如唐代的山林佛教传统令潮汕随处可见山林寺院和岩窟寺院，具有农禅并重的禅宗修行特色；宋代的福德佛教使僧人具有强烈的入世利生精神，积极介入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倾向于都市佛教、市民佛教的特点，同时也培育了深厚的崇佛之风；明清以来的民俗佛教，则与小庙林立、僧人戒律不严、僧人大量入住祠庙、香花佛事兴盛等相联系，如此等等，这便是“佛教的地方化”。另一方面，佛教也始终参与对潮汕文化的历史建构。佛教对潮汕文化的影响是一种浸渍式的影响，完全渗透其中，佛教也最终成为地方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发展出具有佛教元素或特色的地方文化，这便是“地方的佛教化”过程。我们可以感受到，从潜藏的思想观念到触目可见的文化事相，潮汕文化无不透露出众多的佛教元素。例如，潮汕多种民间宗教信仰和善堂文化的研究，就无法与佛教完全剥离，离开佛教就可能谈不清楚。如果我们暂且撇开“因果报应”等佛教思想观念，单就文化事相而言，佛教的元素也都是非常鲜明突出的。诸如潮汕饮食文化中的素食、建筑文化中的佛寺建筑、方言文化中的佛教俗语、民间艺术中的潮州佛乐、礼仪文化中的佛化葬俗、节俗文化中的佛教节日以及组织文化中的善堂等，就是其中荦荦大者。

素食文化 潮人非常讲究饮食，潮菜本身就是中国烹饪艺术派别的一大流。旧日佛风浓厚的潮汕城镇，寺庵遍布，和尚尤其是尼僧们都长期素食，极擅长做素菜，在家的善信自然跟进，素菜愈做愈精美，既可以供佛，也可以自己享用，甚至会应他人所请而制作素食宴。有了这样的社会需求，素食文化也就迅速发展起来，民国时期素菜已进入商业化经营或半商业化经营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后，适应商品化社会的潮流，潮汕各地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素食餐馆，甚至出现了素食店连锁企业，佛门善信及外地旅游者品尝后，无不啧啧称美，成为本地区一大饮食特色。

佛寺旅游文化 继唐代大颠的山林佛教的余绪，历朝历代的一些僧人遁入桑浦山，揭阳黄岐山，潮阳东山、曾山一带，草衣木食，开岩安禅，以求见性明心。而今虽然是“昔人已乘黄鹤去”——绝大部分僧人及其修行情况无考，却留下了不少形态各异的石窟寺院，成为今人游览、朝拜、追思的去处。除山林佛教的石窟寺院外，一些都市佛寺也颇有特色，唐初，潮州郡城就建有广法寺（元代后称为南山寺），而开元寺更是潮汕最大的官

敕寺院。宋代潮汕城市逐步繁荣、城乡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寺院经济同世俗化社会密切联系，于是，新寺院主要创建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集市、村落以及主要的交通要道上。其后各朝鼎建的都市佛寺也为数不少，著名的如潮州的叩齿庵、古大士庵，揭阳双峰寺，澄海龙潭寺、塔山寺，潮阳的治平寺，惠来的榕石寺、永福寺，饶平的隆福寺、林姜寺，汕头的证果寺等。这些都市型佛寺的境遇颇不相同，有的寺院已经湮没，有的废圯，有的重建，保存下来的寺院的大小、形制、建筑特色和寺院文化也有一定差异，也是人们旅游观光朝拜、寻幽访古的好地方。

佛化俗语 潮汕话属闽南语系，但富于地方特色，佛教对潮汕地区的深刻影响也很大程度地在其方言文化中反映出来。大量词汇、成语、俗语、歇后语等都包含着佛教因素，闪耀着佛门睿智之光，反映出潮汕人的思想观念，成为宝贵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遗产。

潮州佛乐 潮州佛乐包括“禅和板”和“香花板”佛乐，是僧人居士或善堂人士在寺院做早晚课诵或法会法事（如打水陆、做亡斋等）当中唱诵时所用的音乐唱腔。香花板佛乐是最先起源于闽西与赣南一带的香花佛事所用的一种音乐板腔，属于民间佛教音乐，在闽、赣、粤交界地区很流行。相对而言，潮汕香花板也因吸收了潮剧、潮曲的唱腔风格而有一定的变异和发展。禅和板则是清初从广州传入潮汕地区的一种独特的寺院型佛教音乐，在广东其他地区包括广州寺院中早已消亡，仅保存在潮州市及潮安县一些地方，成为潮汕本地独有的寺院梵呗。禅和板和香花板，一来源于寺院，一成长于民间，两者的音乐特点颇不相同。禅和板以庄严典雅、婉转悠扬见长，最具梵呗基本精神；而香花板的旋律热烈昂扬，富有灿烂活泼之趣。两者都成为潮州音乐家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佛教与潮州文化高度结合的产物，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欣赏价值。

佛化葬俗 潮汕古代曾流行火葬，从出土文物及各种文献资料来分析，火葬习俗主要受佛教的影响。火葬习俗流行的时间较长，直至清代雍正年间方彻底绝迹。而民间的佛化葬俗即做功德（做亡斋）则一直延续至今，如今做佛事的主要为善堂的神职人员。做功德法事体现了儒家的孝亲、积德思想与佛教“诸恶莫做，诸善奉行”观念的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扶风正俗、荡涤人心的正面作用。

佛教节日 佛教传入潮汕，也为本地区增添了多种新节日。一方面，这些佛教节日为民俗文化带来了新的内容，如禁屠、素食、营建法会等；另一方面，这些佛教节日也逐渐发展出一些新的民俗涵义及仪式，透露了潮汕人的信仰态度和宗教期许，具有了鲜明的本土化倾向。在潮汕，佛教节日多达十几个，其中较隆重的节日主要有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诞、四月八日浴佛节、六月十九观音成道、七月施孤等。七月施孤（普度）是潮汕最重大的全民性节俗之一，与全国其他地方类似，是从最初体现佛教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法事，是重新回归到中国本土化的一种祭鬼的民间信仰仪式，但其中包含有积极的文化内涵。施孤的对象主要是孤魂野鬼，体现了佛家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博爱精神。

善堂文化 善堂的创建与后人纪念宋代大峰和尚修造潮阳和平桥的事迹有关，有着深刻的佛教历史渊源。潮汕最早的善堂为创始于康熙年间的揭阳县慈济会堂（详见本书第七章）。明清以来，潮汕各地善堂林立，大都以扶危济困、行善积德为事，是慈善公益事业开展中的主力军。善堂影响及至东南亚各国，善举成就斐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潮汕善

堂复兴,发展十分迅速,现有善堂 350 间以上^①,密度为全国之最。潮汕善堂的这种慈悲济世精神无疑属于积极的因素,值得加以引导、扶植并发扬光大,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新贡献。需申明的是,潮汕善堂既是一种慈善机构,又是一种特殊的信仰场所,兼具信仰与组织两个方面的因素。善堂既开展慈善公益活动,也举行各种神事活动。作为信仰形态来说,内容又颇驳杂,思想来源繁多,儒、道、佛、各种民间宗教思想竞相杂糅,超出了佛教研究的领域。但它与佛教的关联又是最为紧密的,因此,我们并非要对其作全面的研究,而是侧重探讨善堂与宗教尤其是佛教相关联的部分,以及信仰与组织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目前,潮汕佛教自是一派兴盛热闹,而这种佛教繁荣状况,也带来不少显而易见的问题。例如,佛教建设太过看重寺院硬件的建设,寺院修建投入过量的资金;一些地方政府及佛教组织过多从经济开发角度考虑,把寺院变成了一种旅游景点和吸金手段;僧人的文化和信仰素质参差不齐;寺院管理出现了一些盲点和漏洞,僧团中产生了一些不法现象或新的社会问题;民众的信仰观念和活动出现了一些偏差,或者说,一些做法与新时期的社会文化不相适应等问题,亟待规范。

潮汕的宗教信仰,尤其是佛教信仰,底蕴丰富厚重,文化价值可谓潜力巨大,值得认真看待和研究,而当代佛教的繁荣及其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也让我们无法忽视。要让历史照亮现实、启发当代,必须从区域文化角度,对潮汕佛教的历史源流,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文化事相的产生与发展,作系统的梳理,深入探究佛教与潮汕文化的历史建构的密切联系,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从而有益于当代宗教文化政策的制定和规范,丰富和发展当代新文化。

基于以上思考,我们有必要撰写一部关于潮汕地方佛教历史文化的专著。

二、研究史回顾

潮汕佛教历史文化研究的先行者为饶锷、饶宗颐父子。在其编撰的《潮州艺文志》卷 10“子部·释家类”中,开列出 10 部潮汕本地的佛学著作,并对其中一些著述作了考释和评价;饶锷的《潮州三山志》中也有部分寺院与佛教人物的记载与考释。20 世纪 60 年代开元寺僧人慧原法师曾致力于搜集潮州地方尤其是开元寺的历史资料,并写出 20 万字的书稿,但未出版。有关潮汕佛教的研究引起重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饶宗颐先生 1987 年写作的《清初僧道忞及其〈布水台集〉》、《〈潮州开元寺志〉序》(1992)及《大颠禅师与〈心经注〉》(1994)等论文,继续对一些重要的潮汕佛教文化现象进行考证。其第二篇论文考证了开元寺现存年代最古的石经幢“佛顶尊胜陀罗尼”咒文出处,得出了是唐不空禅师(705—774)译本,且是“粤中经幢信为最古而可贵之鸿宝”的结论,对认识和保护开元寺珍贵文物具有特殊意义;《大颠禅师与〈心经注〉》则考证了记在大颠名下的《心经注》等数种著作,实为宋代另一僧人所作。他不蔽于一般乡邦感情,实事求是,了却了潮汕佛教史上的一桩公案。

^① 徐苑:《大峰祖师、善堂及其仪式:作为潮汕地区文化体系的潮汕善堂综述》,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第 10 页。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佛教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探索佛教与区域文化的关系,除出版相关研究专著和发表论文外,各县市陆续编写了不少地方佛教史志,创办佛教刊物,把区域佛教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就潮汕佛教历史文化研究而言,其中,僧人法脉传承方面,有林俊聪编写的介绍清末潮汕临济宗僧人仁智法脉传承的《天南法乳》^①,虽然在资料的掌握以及分析处理方面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在率先让人们注意到潮汕近代禅宗传承盛况这一点上是很有意义的。同类题材还有释智楠主编的《临济后裔——化能一脉》(内部刊物 2002 年版),对清末临济宗浙江普陀山伴山庵住持、潮阳人化能心澄及其潮汕僧侣后裔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该书展现了从清末迄今临济宗另一支法脉在潮汕的传承盛况,但因资料掌握所限,某些重要人物如化能心澄的生平甚至生卒年记载模糊不清。善堂文化方面,最早进行搜集研介的为翁兆荣、许振声两位前辈,他们于 1989 年写出长篇论文《概述解放前潮州城的慈善团体——善堂》,并于 1995 年续写《潮州城善堂续话》,分别发表在《潮州文史资料》第 8 辑和第 14 辑上,开潮汕善堂文化研究之先河,引起世人的关注;中山大学教授林悟殊于 1996 年出版了《泰国大峰崇拜与华侨报德善堂研究》(台北:淑馨出版社 1996 年版)一书,对潮汕善堂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在泰国弘传、发展的情况进行了独到的研介,拓宽了潮汕佛教文化研究的新视野,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期昌熹主编的《升平文史》的创刊号《潮汕善堂》专辑(1),对潮汕本地善堂文化作了进一步的搜罗,资料更为宏富;徐苑著有《大峰祖师、善堂及其仪式:作为潮汕地区文化体系的潮汕善堂综述》(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将潮汕善堂视为一种文化体系,是一种信仰与组织的整合,成为近现代潮汕人自我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后有潮州庵埠广济善堂、庵埠广济福利会理事会编写的《广济善堂创建一百周年纪念特刊》(内部刊物 1999 年版),以及太和善堂董事会编《太和善堂创立一百周年特刊》(内部刊物 2001 年版),对潮汕庵埠镇广济、太和二善堂的历史进行了较为完整的介绍。

寺院介绍及佛教史志方面,由行政部门或个人编写的地方佛教史志不少,如饶平宗教局编写的《饶平佛教志》(内部刊物 1987 年版)和《饶平名寺录》(内部刊物 1990 年版),陈亿义主编的《澄海县宗教志·佛教志》(内部刊物 1988 年版)等,这些著作都较简略;2004 年林俊聪出版《潮汕庵寺》共三册(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4 年版),在寺院历史和文化的资料方面搜罗较为细致翔实,但所开列的寺院还较少,一些碑记文字抄写有错漏,其中下册第五卷写潮汕名僧,变成潮汕名僧传了,与书名不相符合;较为详细的是 2009 年由香港天马出版社出版的《汕头佛寺》(主编周淑珍)、《揭阳佛寺》(主编周淑珍)以及《潮州佛寺》(主编林福治),三书图文并茂,较为全面地对目前潮汕开放寺院作了一般性介绍。佛门内部人员也参与编写,如已故潮州开元寺住持释慧原在这方面就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 1992 年出版《潮州市佛教志·潮州开元寺志》一书,其 80 万字,对潮州地区(仅及今潮州市湘桥区及潮安县,不包括饶平县)的佛教文化尤其是潮州开元寺的寺院文化作了全面深入的介绍。该书编写历时 30 年(1961—1992),建立在大量的文献

① 林俊聪:《天南法乳》,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 年版。

查阅及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内容宏博,分析精到,为潮汕佛教研究的最重要成果,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它也因内容庞杂,在编写体例和材料的归类上尚有可商榷的地方。此外有两位学者的论文也值得一提,一篇是黄挺的《新发现的南宋潮州开元寺资料——林希逸〈潮州开元寺法堂记〉及其考证》,另一篇是马明达的《元代潮州路金石文字辑目》,分别介绍了新发现的潮州古代寺院资料,很有价值。佛教人物研究方面,则有黄挺的《唐临与佛教思想在潮州的传播》,郑彝元所编的《大峰祖师传略》等。佛教刊物方面,1988年创刊的《广东佛教通讯》(后改刊为《广东佛教》,内部刊物)及1994年复刊的潮州开元寺岭东佛学院院刊《人海灯》(内部刊物),也一直刊发不少有关潮汕佛教文化的文章。佛教音乐方面,释慧原也是研究先驱,除在《两志》中立有专章探讨潮州佛教音乐外,还与陈天国、苏妙箏编著《潮州禅和板佛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并出版相关音像资料,对潮州佛乐的历史、功德、特点进行较全面的研究介绍,并附有163首佛乐简谱,为保存濒临失传的地方传统文化艺术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2004年陈天国、苏妙箏出版《潮州音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也有相关部分论述潮州佛乐,富有成果,令人称道。

笔者于1991年亲近开元寺慧原法师,受其大著有关王弘愿论述的启发,搜求民国时期佛教刊物《海潮音》以及本地尚存的文史资料,1995年在《潮学研究》第3期上发表了《王弘愿与东密》一文,在新时期较早地向人们介绍民国著名佛教密宗居士王弘愿的生平思想,揭示近代潮汕乃至广州、香港等地佛教盛行日本东密的这种独特现象。笔者的潮汕佛教文化研究即起步于此。此后在潮汕佛教文化这一领域里,笔者陆续发表了近20篇论文,涉及寺院经济、人物、文学、民俗等内容;2000年出版《佛教在潮汕》一书,但该书作为“潮汕历史文化小丛书”之一,篇幅迫狭,未能展开,不少内容尚未纳入,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充实。

近年来,尽管也还有一些有关潮汕佛教文化的论文发表,一些史著如黄挺、陈占山《潮汕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黄挺《潮汕文化源流》以及陈泽泓《潮汕文化概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也提及一些佛教内容,但总的来说,相比其他领域,如潮汕士绅文化、戏曲文化、潮汕方言、韩愈研究等,潮汕佛教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较少,探讨不深入,并处于零散化状态,缺乏宏观性、系统性的论述,迄今尚未出现一种宏观描述潮汕佛教历史文化的学术专著。

三、基本观点和主要叙述架构

若从宏观视野来看,潮汕地区的佛教史似乎平淡无奇。这里既没有诞生过卓有建树的高僧,也没有产生过煌煌的佛学巨著,更没有形成某些显赫的宗派体系,但本书关注点不在这里。本书既然是从区域文化研究角度出发,就将紧紧围绕“佛教的地方化”和“地方的佛教化”这两大问题展开讨论,具体入微地探讨佛教与区域文化的互动建构。佛教传入潮汕后,逐渐适应本地的自然、人文环境,并积极参与到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与社会经济、道德、习俗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构筑,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塑造了特质鲜明的潮汕文化。基于上述思考,本书旨在不仅撰写一部潮汕区域的佛教史,而且力图把它写成一部佛教对潮汕文化形塑的影响史。

本书综合历年来的研究心得,在充分参考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资料、拓宽视野、提升观点,围绕“佛教与潮汕社会文化建构的关系”这一中心论题,试图对潮汕佛教历史文化作全景式的描述,凸现佛教对潮汕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本书主要叙述架构分为潮汕佛教的历史叙述和佛教民俗文化两部分。

历史叙述部分共四章(第二、三、四、五章),上限为南朝刘宋年间(420—479),下限为1949年,共1500多年。本书第一章首先概述潮汕地区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试图剖析潮汕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产生的基本土壤;然后,为了避免胡子眉毛一把抓式的笼统记述,根据现存资料的多寡,把潮汕佛教的历史发展过程冠以四个名目:“山林佛教”,“福德佛教”,“民俗佛教”和“东密”,以期展现不同时期佛教文化的基本特色。需申明的是,其实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就可以把与佛教有关联的人分为出家佛教徒、在家佛教徒和非佛教徒三种基本类型,又可以把出家佛教徒分为精英型和世俗型两类。虽然这种区分有些生硬粗糙,但不同基本类型的人因为宗教需求和追求目标的不同,所展现出来的信仰和修持的作为和姿态是不同的。所以,同一时代存在不同的佛教类型,当我们说唐代特色为“山林佛教”,宋代为“福德佛教”时,并非说唐代没有福德佛教、宋代没有山林佛教,而是因为唐代福德佛教方面的所存资料委实不多,无法展开讨论,而宋代现存资料则确实实向世俗型出家佛教徒以及在家佛教徒倾斜,福德型佛教在宋代潮汕得到充分的体现;明清以来的“民俗佛教”则是宋元福德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或异化,只不过在佛教寺院的功能及其僧人的角色、职志上,与宋、元代相比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表现为以迎合、俯就庶民的宗教意识、现实利益、愿望追求等为能事,从而使宋代以前尚维持的独立性、超越性宗教品格最终丧失,而与中国民间思想观念、民间信仰、民间习俗混融合一;尤其表现为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具有潮汕本土特色的佛教民俗文化。这一时期普通民众在信仰生活上唱主角,出家佛教徒唱配角,堪为人天师表的出家精英佛教徒凤毛麟角,而普通民众对佛教信仰几乎混同于其他信仰,所以我们侧重叙述普通民众所认识 and 理解的佛教即民俗佛教。当然,对于开元寺这一尚且较为独立的寺院,以及潮汕清代以来禅宗三大派系也作相应的叙述。近代潮汕地区东密居士佛教暴盛,这一重要的佛教事件当然是我们考察的重点,对当时的出家佛教的叙述则作一般处理。

简言之,从唐代佛教到民国佛教,本书的关注点是逐渐从出家佛教到在家佛教、一般民众信仰的位移,也就是说,本书把潮汕佛教史分为上述四个所谓的阶段,主要由客观上资料多寡和主观上叙述重点的不同所决定,并从中力图围绕“佛教的地方化”和“地方的佛教化”这两大问题来加以讨论,以勾勒佛教的发展脉络并凸现在潮汕区域文化建构过程中的意义与价值。

在对出家佛教的历史发展进程的描述当中,研究重点将放在寺院经济和影响较大的佛教人物上,因为经济是文化的基础,而人物是文化创造的主体。

第二部分是佛教民俗文化和善堂文化,指的是“地方的佛教化”。我们将重点探讨以上所提到的佛化节俗、潮州佛乐、潮州素食、佛化俗语等宗教文化事相,这是本书的难点。至于组织文化的善堂文化则比较特殊,它并不完全属于佛教民俗文化,却与佛教有极深的渊源,具有浓厚的佛教元素,我们慎重地独立成章加以探讨。我们不追求面面俱到、门门深入,而将会根据笔者知识视野的广狭、资料掌握的多少、研究的浅深,做到有详有

略，但在每个文化事相研究上力求有所突破。

总之，本书力图较为深入、全面、立体地把握潮汕佛教的历史发展，及其对潮汕文化各方面的影响，并从佛教这一侧面认识和了解潮汕文化的特色。

四、主要的研究方法

本书既然要试图对潮汕佛教历史文化作全景式叙述，就不局限于使用某一具体的历史学研究视角或方法，而是综合多种原理和方法进行研究。具体来说，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根据历史学、宗教学、文化地理学、文化传播学、民俗学等原理，借鉴前人和时贤的已有成果，进行田野调查，综合运用方志、笔记、诗文集、碑记石刻和出土文物等资料，以宏观把握为经、微观分析为纬，采用文物互证等多种方法进行研究。

所谓宏观把握，主要从佛教传入潮汕以后，理顺其发展过程及其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微观分析，就是通过某些历史文化事相的具体解剖，凸现潮汕文化建构当中的佛教渗透和影响；文物互证，即注意历史文献、经典和碑记石刻、出土文物等资料的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力求较准确全面地反映潮汕佛教文化的面貌。

笔者才薄性懒，智井瞽人，拙著非一夕毕功，零敲碎打迄今，过程长达二十年，俨然三家村学究。其中多个章节已以论文形式先行发表，薄有反响，论文纳入本书中另有删改。拙著的勉强完成，算是对笔者多年来笔耕潮汕历史文化的一点交代。然拙著撰作并未达预期目标，也必然存在各种不足与错漏，各位方家读者有以教我，是以为幸，并期以为同道，共同参与研究潮汕佛教文化。

